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海外学子系列

刘·东 主编



In Search of Justice

寻求正义

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The 1905—1906 Chinese Anti-American Boycott

〔美〕王冠华 著

刘甜甜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海外学子系列

刘东主编

In Search of Justice

寻求正义

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The 1905—1906 Chinese Anti-American Boycott

「美」王冠华 著

刘甜甜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 [美]王冠华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7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7-214-04778-6

I. 寻... II. 王... III. 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研究
IV. K257.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7217号

In Search of Justice: The 1905—1906 Chinese Anti-American Boycott, by Guanhua Wang,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2001.

Copyright © 2001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s © 2008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6-146

书 名 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著 者 [美]王冠华
译 者 刘甜甜
责任编辑 王 田
装帧设计 阿 海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pspress.cn>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7.375 插页4
字 数 189千字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778-6
定 价 1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 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译者的话

《寻求正义》的作者王冠华博士 1955 年生于江苏南京，1982 年获山东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85 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7 年赴美，1994 年获密执安州立大学东亚史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副教授，上海大学、山东大学兼职教授。除本书以外，作者还在《历史研究》、《二十一世纪》、*Chinese Historian Journal of American - East Asian Relations* 等中外杂志上发表文章多篇。

王冠华博士先后师承多名中美著名近现代史学家。山东大学路遥教授、南京大学王明中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孔华润教授 (Warren I. Cohen) 和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的韦思谛教授 (Steven Averill) 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对王冠华博士有着重要的影响。

《寻求正义》把 1905—1906 年中国民众抵制美货运动这一“事件”置于 19、20 世纪之交华人移民出国潮和欧美帝国主义扩张——不妨称之为第一轮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展现出中外文化思想、法规政策、劳工商品间交汇和碰撞的宏大画面。本书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晚清中国民众像中外大量著作所描述的，为乡土意识和地域经济所割离束缚，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一场组织有序、遍及全国并得到

海外华人物质协助和声援的和平抗议运动？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很难回答。作者没有满足于“民族觉醒”这一夸大意识形态作用的解释，而是沿着新近出现的社会运动理论——特别是理性选择和组织资源派——的思路，分析运动发起、组织、参加者的身份认同、利益归属和各群体间联络及协作的能力和资源。以这样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寻求正义》一书没有局限于描述美国种族主义排华政策所激起的华人各阶层的普遍“民怨”，而是更深入地到社会结构性变革过程——市场联系的扩展、信息传播的近代化以及各种市民团体的出现——之中去探讨运动的时代特征。因此，广东这一北美移民最多、百姓积怨最深的地方并没有得到作者过多的关注，而晚清思想文化、社会组织、贸易往来最活跃、最活跃的上海——虽然来自沪上的海外华人寥寥——则成为作者所瞩目的运动中心。

独特的视角和分析方法使得《寻求正义》一书实际上隐含了两个叙述。一个叙述把旅美华侨和广东等地侨乡民众——主要是通过共同的经济利益——连结在一起，他们发起、参加抵制美货运动的动机和目标主要是美国排华法律。另一个叙述以上海为中心，分析各地域的中国人——无论其是否身受美国排华法之害——是如何通过民族身份认同和正义感的激发而连结起来。前一个叙述着眼帝国主义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悲惨遭遇，后一叙述则描述晚清国际都市化的发轫。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寻求正义》对于晚清报业、电报等传媒以及抵制美货宣传文本、语汇中所表现的中外新旧思想交融、撞击的分析，是全书比较精彩的部分。

两个叙述同时也隐含着抵制美货运动难以持久和最终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迫使美国废除排华法——的原因。作者毫不隐讳这场爱国运动内部的深刻矛盾：利益和正义之间的冲突。换言之，如果抵制美货者寻求的是正义，则宁可失败也不让步；如果他们寻求的是实际利益，则必须妥协、让步，乃至接受较温和的排华法案。作者发

表在1999年1月《历史研究》上的文章,更简洁明了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寻求正义》并没有发掘引用“独家”资料,尤其是未能参考台湾档案馆馆藏的大量晚清华工资料。但是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使用了大量新闻报道、文章以及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资料。正是因为作者分析角度和引用资料的广泛,《寻求正义》一书引起了许多不同科学家的注意和评论。研究亚裔美国人的学者拉尔森(Jane Leung Larson),研究美国史、国际关系史的学者斯卡利(Eileen Scully),研究人类学、移民史的学者麦克考恩(Adam McKeown)以及一些研究海外华人文学的学者,分别在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Pacific History Review*,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Law & Social Inquiry* 等学术杂志对该书做出评论或者摘引。此外,《寻求正义》一书还被许多学术指南列为研究清史、亚裔美国人史、中美关系史、反美思潮和运动(Anti-Americanism)、抗议运动(political activism)以及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参考书。

总之,和之前有关抵制运动研究的中国和美国学者相比,王冠华博士使用了更丰富更多样化的原始资料,对作为一场跨国性政治运动的抵制美货运动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多层面的论述。《寻求正义》成功地把抵制运动的两大分析要素——美国华人的反排华斗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觉醒——结合起来,说明抵制运动是一个整体性叙事,把包括美国华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不同利益整合在了一起。有理由认为,《寻求正义》以其宽阔的学术视野和社会运动理论的运用,为中国近代民众运动研究开辟了新路向。

刘甜甜于青岛大学
2008年4月10日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导言	1
第一章 中国移民与美国排华	18
第二章 晚清政治话语中的移民	41
第三章 抵制运动前的大众行动	68
第四章 商人与抵制美货运动的起源	87
第五章 初始阶段:确定抵制策略和支持者	116
第六章 强权与公理:抵制运动的思想意识	144
第七章 第二阶段:大众采取行动	171
第八章 镇压与转化	191
结语	205
主要参考书目	213
译后记	225

导 言

19世纪50年代,当美国华人开始建立自己的社群以后不久,美国对中国移民的种族歧视也日益严重起来。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在10年之内进入美国。此后几十年里,又出台了一些更为苛刻的措施。到20世纪初,严厉的排华法案已极大地威胁到中国人社群的存在。在清除“苦力劳工”的名义下,美国移民管理人员不加区别地骚扰、羞辱所有的华人,包括合法居住者以及商人、学生一类有特权的华人阶层,甚至包括那些显然不受这些法案限制的官员(Tsai 1976; McKee 1977, 1986)。

对于美国华人社群的商人领袖来说,美国和中国签订的有关华工问题的条约于1904年到期,提供了一个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大好机会。为了阻止两国签订一个将在国际法上使排华合法化的新条约,这些商人领袖一方面设法游说清朝政府,一方面号召中国抵制美货。

1905年5月,被华人同胞在美国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所激怒,商人、学生、妇女、儿童、医生、船夫、甚至乞丐,在中国二十多个大小城市发动了抵制美货运动。积极参加这一新兴运动的人们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在商店橱窗和街道两侧悬挂各种各样的招贴。广州的抗议者把写有抵

制美货口号的风筝送上高高的天空,上海的演员们在舞台上演出爱国的戏剧(阿莫 1962: 669),反对排华的小册子、传单、小说、诗歌到处传播。群情异常激愤,甚至有一名年轻人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前服毒自杀,成为中国近现代城市政治抗议活动中的第一名烈士。

从1905年7月22日到9月3日,仅仅在上海《申报》这一家报纸上,每天至少刊登出一份支持抵制美货的申明,总共代表着大约13 000个人和商号。生活在东南亚、澳大利亚以及美洲各国的海外华人也举行各种形式的抗议集会,支持这一正在发展着的运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为此运动提供了数万美元。时人指出,从未有过任何一场民众运动,像抵制运动这样发展得如此迅速,传播到如此广阔的地区(苏绍柄 1906:15)。到第二年,在严重地干扰了商业贸易并且招致清政府镇压之后,抵制美货运动才逐渐平息下来。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抵制美货运动是最早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民众运动。^① 不过,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跨国性。尽管大众抗议的场面是在中国出现的,但这一运动却是由美国华人发动的,并在其后得到了世界许多地区的海外华人的支持(McKee 1986, Wong, 1995)。此前有许多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抵制美货运动是新思想尤其是民族主义的体现。本书则试图说明,这一运动表现了多层面的联系——有制度上的,也有感情上的;有地区性的,也有跨国性的,这些联系把不同地区的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中国人凝聚到一起,使他们能够进行一次坚决而又和平的抗议活动。

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方面,本书还试图增进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表面看来似乎是悖论的现象的理解:大多数中国人一直受家庭、宗族和本乡本土等地方性联系所束缚,但中国从未缺少过全国范围的民

^① 中国历史上有过为众多的大规模农民叛乱,而抵制美货运动是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城市民众运动。蔡石山(Tsai 1976: 95)认为它是“义和团事件和1919年五四运动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反外运动”。关于明清时期的城市骚乱,见 Yuan(1979: 279-320)。

众运动。^①正如本书所论述,抵制美货运动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产物,不如说是19世纪后半期广泛的结构变化的结果。比如扩展了的市场联系,电报和日报的产生,以及各种组织的出现和转化。尽管更为宽阔、更为频繁的各种接触未必一定会推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趋向一致,但这些接触确实有助于联合行动能够更为有效地发动起来。就像鲁赫特(Dieter Rucht)所说:“对于大规模的、持续性的运动行动来说,它的动员需要诸如人员、金钱、知识、组织框架、技巧和技术工具等资源,才能处理和传布信息,影响民众。”(Rucht 1996: 186)

对于研究近现代中国、中国国际关系和亚裔美国人的学者来说,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是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挑战。然而,由于学科界限和学科范式的束缚,抵制美货运动历史的研究至今未有令人满意的成果出现。主流的中国研究擅长使用的取向和方法,还不足以说明世界范围内的中国人中间那些不断变动着的关系。自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1977)提出中国九大区域理论、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66)倡导地方性研究、柯文(Paul Cohen 1984)呼吁“中国中心取向”以来,地方史或者区域史几乎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唯一路径。当然,地方研究通过探讨不同区域的差异性,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本书也把地区多样性引入到社会网络和抵制策略的分析之中。不过,地方研究取向在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之间划出了过于清晰的界限。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表明,我们不能以单纯的地方意义来理解任何一个城市和城镇的抵制行动,因为每个地方都会因了解到其他地方有成千上万人参加抵制而得到鼓励和力量(参看塔罗有关运动圈的观念, Tarrow 1994: chaps. 1, 9)。

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民众运动具有国际性,抵制美货运动也是如此。外交史家的许多研究都提到这一点(如 Hunt 1973, Iriye 1967),

^① 关于传统地方情结在中国工人和商人中的作用,见 Honig(1986)和 Goodman(1995)。

但是这些研究的关注点是政府间的关系；而不是政府和它的人民之间的关系。结果，抵制美货者和清政府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始终就未能得到清晰的说明。

在先前有关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中，学科区界的问题十分明显。历史学家一直在书写着两个相互分离的叙述，一个是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它表现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另一个是移民海外的华人发动的运动，其目标是争取在美国的生存。^①一些流行的教科书也应和着这两方面的观点。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畅销书《寻找现代中国》就认为，抵制美货运动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表现，“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种新型民众运动”(Spence 1991: 238)。另一方面，研究亚裔美国人的杰出学者陈素贞则强调北美华人的中枢作用。她在《亚裔美国人：一个解说史》一书中，引用了麦基(Delber L. McKee)“(抵制行动的)爆发时机是在美国的几个活动发展的结果”的论断，并且进一步提出，北美形势对于这一运动的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抵制在广州地区坚持时间最长，那里的行动一直得到来自北美华人汇款的支持。但是，在旧金山的唐人街被1906年地震破坏以后，这一资金来源就戛然而止。”(Chan Sucheng 1991: 97)

太平洋两岸中国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怎样会使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塑造了“中国历史的这一新型民众运动”的发展进程、斗争策略及其目标？本书试图运用多学科视角，并且试图通过打破学科界限的研究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在许多优秀的区域研究的启发下，本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那些支持和参加这一运动的人代表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然而，就像新近一些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尽管现代化进程改变着中国尤其是中国的沿海城市，但传

^① 有关第一个叙述，见张存武(1966)和朱士嘉(1958)；有关第二个叙述，见 McKee(1977, 1986)。

统的、地方性的联系仍然支配着人们的集体行动(Perry 1993, Honig 1986)。虽然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有着同样的不满,但他们之间的合作必定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社会科学家那儿借用一个名词,抵制行动无疑会涉及到一个很高的“社会交流成本”,即参加这一运动的各个群体之间进行联络和协调的成本(Tarrow 1994: 189)。

“民族觉醒”说

大多数历史学家会同意路康乐(J. M. Rhoads)的看法,他把抵制美货运动解读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初表现”。^①台湾中央研究院张存武有关抵制美货运动的著作是迄今最为全面的研究,认为这一运动之所以得到普遍支持是由于“民族觉醒”。这一觉醒的意义“是中国人民争取国家主权的完整与独立,民族地位的平等与尊严,凡是妨害这些原则的,一律加以反对。美国排华违犯此旨,所以抵制美货。”(张存武 1966: 243)

“民族觉醒”说使人想起了“大众社会”研究^②,它强调大众运动动员中强烈而广泛的不满的作用。在张存武和其他许多研究者看来,中国人在中日战争(1894—1895)和义和团起义(1899—1901)中所遭受到的耻辱性失败,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蔡石山着力于这一历史情境,认为美国排华法案对中国人尊严的侵犯,远远超过了对中国人利益的损害。他进一步论证说,这也正是这一运动能够吸引商人、医生、学生、妇女以及船夫等形形色色社会群体参加的原因(Tsai 1976: 88—89)。这样的观点为许多人所接受(Hunt 1983, McKee 1986)。

① 例如,鲁赫特(Rhoads 1962: 155)称颂这一运动为“中国民族主义作为大众性政治运动的最初表现”。香港和台湾的学者认为“(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中国毫无疑问地表现为民族重建思想强烈而又明确的表达”,认为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是“新民族主义的表现”(Liao 1986: 57—59,张存武 1966)。亨特(Michael H. Hunt)做出了“1905年事件发出了新民族主义中国产生的第一个信号”的类似论断(Hunt 1973: 93)。

② 有关大众社会研究的透彻讨论,见Hans Toch(1965: 4)。

但是,与之前的大众社会研究不同,“民族觉醒”说在描述占支配地位的大众心理时,其重心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恐慌、歇斯底里或者狂热。民族主义这一现代思想意识,被认为可以说明抵制美货者“反对外国列强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有纪律的、文明的方式”(Iriye 1967: 223)。然而,以民族主义为重心,模糊了而不是阐明了运动的起源和社会动员。从整体上给这个运动贴上这样的标签,并不能解释个人或是社会群体的行动。既然有相当广泛的阶层参与了抵制行动,那么,认为他们只是受到了一种现代思想的鼓舞,似乎并不太合理。其他许多思想,包括某些传统思想,也是推动一般民众参与的力量。^① 传统的历史研究未能解答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运动实质上是要表现什么呢?还是要改变什么?换句话说,有些人把这一运动看作是经历挫折后的发泄机会,但会不会有另外一些人因为事关经济生存而谋求改变美国移民法案呢?“民族觉醒”说没有看到,参加者的利益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驱动因素。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分析抵制美货运动时,把物质利益置于思想和感情因素之上。他们用史料论证了广泛的结构变化,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在晚清民众抗议活动兴起中的极端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受过西方训练的历史学家朱士嘉,认为抵制美货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资本家相冲突的结果(朱士嘉 1958: 7)。同样地,日本学者菊池贵晴把抵制美货运动与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以及经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日渐流行联系起来(Takaharu Kikuchi 1974: 18—26),并且认为中国的资本家领导了这场主要为城市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运动,而其他社会阶级则随之而起。抵制美货运动的确是中国商人领导和组织的,但这只是一时性的,而且也不是所有地区都是如此。“商战”思想是抵制话语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用来解释这个运动的问题在于,它使用

^① 可参见我对抵制美货思想的分析(G. Wang, 1995)。

政治修辞,一些即使是商人自己也不常使用的政治修辞,来表达真实的经济利益。然而,在20世纪初并没有这样的资产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也就难以明确指出能够从抵制美国货物中受益的个人和工业。据菲尔德(Margaret Field)所说:“商人在议论阶段最为积极,而事发后的参与明显不足。不过广州例外,那儿曾经感受到沉重的经济压力。”(Field 1957: 80)而按照奥尔森(Mancur Olson)的论点,即使抵制行动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这一阶级的个体成员也未必一定会为他们的集体福祉而斗争(Olson. 1965: 105—106)。

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民族觉醒”说和阶级利益说有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认为在宏大的历史力量——物质的或者精神的——和特定的历史事件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一些对这一问题有所认识的历史学家,把研究重心放到了最初引发大众抗议的移民争论上。麦基——撰写过有关排华法案和抵制运动最为详细的英文论述的外交史家——对“它(抵制行动)的出现笼统地说是由于排华政策,或者只是因为中国民族感情的兴起”的看法,表示了怀疑。他认为:“1902年的排华法案常常被看作是对先前法案的微小修订,实际上却代表了排华运动的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超越了劳工的范围,沉重地打击了上层中国人,尤其是商人和学生。”因此,麦基得出结论说:“这一运动在美国发动,是由于排华政策的特殊阶段使美国整个华人社群感到了绝望。”(McKee 1977: 216—217)

在着重注意这一运动的国外起源时,麦基突出了当时正在海外华人中积极活动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政治流亡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康有为等人是抵制活动最早的组织者和推动者(McKee 1977: 110, 1986)。法律史家萨尔耶(Lucy E. Salyer)新近的一项研究支持了麦基的观点:20世纪最初几年,美国华人开始失去他们最后的制度性保护——法院。

在麦基看来,美国华人采取行动反对美国种族主义,并非像张存武

和其他人所认为的,是因为思想的觉醒,而是因为有关的物质利益;也不像朱士嘉所提出的,是因为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是因为对他们生存的特定关注。这样,麦基的解说就把抽象的感情——中国民族主义——和具体的利益联系起来。根据他的论述,流亡的中国改革者们要得到来自美国华人的财政支持和政治支持;反过来,改革者们可以在他们有着广泛联系的中国国内帮助移民们寻找支持。麦基的说法很有说服力,但它只能说明抵制运动的发起,并不能说明这一运动在中国国内的传播。一小群主要兴趣在于宪政改革的精英分子,是如何把城市大众动员到一个宏大运动中去的,并未得到清楚的解释。康有为和梁启超控制国内立宪派的能力,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估计,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① 何况在参加抵制活动中的人中,立宪派只是一部分,还有文人群体、研究会、读报会、演讲会、妇女团体、商会和其他社会组织。海外华人和他们在中国的同胞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把这一复杂的运动概念化?

作为社会运动的抵制美货运动

抵制美货运动显示出社会运动的一些特点。社会运动是18世纪首先在欧洲和北美出现的一种现象(Tarrow 1994: pt. 1),与抢粮骚动、宗教冲突、农民叛乱不同,社会运动涉及的地理范围广阔,采用标准而又灵活的集体行动方式,并且有着广泛的诉求。在这些特点中,“抵制、罢工、大众抗议和示威”的行动方式最为重要,因为集体行动的这些方式能够被不同地区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为了不同的目的轻而易举地加以复制。比较而言,“旧”的斗争方式往往与某个具体的不满有着太过特定的联系,其目标也过于狭窄地集中在某个直接的敌人身上,从而难以具有跨

^①《时报》主人狄楚青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他与梁启超的关系这一时期开始恶化。